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叙述方法”的批判

庄忠正 杜雪曼

【摘 要】“历史叙述方法”是逻辑地再现历史发展过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叙述方法。蒲鲁东运用系列辩证法构建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叙述方法,以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编排经济范畴的历史顺序、以永恒的经济范畴把握社会生产关系、以天命的目的阐明社会历史进程,使历史的辩证性和丰富性窒息在抽象的真空中,公式的运动代替了现实的运动。马克思从理论前提、方法论、理论实质三个维度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叙述方法展开全方位批判,指出其在本质上是德国观念论的简单模仿,是冒牌的黑格尔辩证法,反映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以现实的历史反对神圣的历史,以历史的辩证法否定系列的辩证法,构建通达现实的具体的科学的历史叙述方法,实现了对蒲鲁东的历史叙述方法的批判性超越。

【关键词】历史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系列辩证法;唯物辩证法

【作者简介】庄忠正,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杜雪曼,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京),2024.2.74~84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马克思的正义思想研究”(23XNA016)阶段性成果。

蒲鲁东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①,他试图把政治经济学与哲学融合起来,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即“社会经济学”的科学化。蒲鲁东的这一理论建构离不开以系列辩证法为中介实现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叙述方法”的支撑。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历史叙述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事事适用,它能答复一切和说明一切”^②,这一“历史叙述方法”只能是服务于主观理论建构的逻辑工具。“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叙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③。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历史叙述方法的理论前提、方法论、理论实质等内容的批判,深刻揭露了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本质及其构成价值论的形而上学性质,并借此建构了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科学的历史叙述方法。

一、对蒲鲁东“历史叙述方法”的理论前提的批判

蒲鲁东关于上帝的假设和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论是其社会经济学核心范畴“构成价值论”必不可少的论证工具。在他的经济体系中,历史地活动着的个人只是思辨哲学中“抽象的人”的神圣化,他以普罗米修斯代指鲁滨逊式个人的集合。现实的人在蒲鲁东的历史叙述中变成了概念设定下非现实性的、工具化的经济人。蒲鲁东试图通过对经济范畴的抽象、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的歪曲,为系列辩证法的展开提供主体、范畴和规律,并为创立构成价值论及经济进化体系做准备。

(一)抽象概念与价值二重性的对立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使用的概念是缺乏中介、未被消化的经济事实的抽象。蒲鲁东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出发,通过“绕圈子”式的叙述风格,在说明使用价值变成

交换价值的过程中预设了交换价值的存在,却没有对交换价值的起源展开历史叙述。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建立了一个抽象的领地,“社会天才”(蒲鲁东本人)是这一领地的领主。在这里他卖弄其形而上学的哲学常识,试图将丰富的建筑材料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图纸建立起行动中的形而上学理论大厦,但在本质上只是抽象概念的同义反复。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在空洞的抽象概念基础之上将供给与效用、需求与意见混为一谈。这个空洞的抽象概念即抽象的人的抽象的“自由意志”。蒲鲁东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是由于个人自由专断而造成的”^④。在他的历史叙述中,抽象的“自由意志”一方面设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区别和联系,另一方面又以普遍理性的具体化形式规定了平等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具体规则。在完成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形而上学的假定之后,蒲鲁东才能在此基础上解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叙述体系中,具有自由意志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毫无自由可言,自由的只是作为社会天才的蒲鲁东的个人叙述逻辑。当蒲鲁东的理论叙述需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时,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按照“普遍理性的意志”开展经济活动;当需要说明交换产生的历史时,生产者和消费者又能“自由”地建议、商定。因此,通过赋予消费者和生产者以自由意志,蒲鲁东运用形而上学将现实的经济活动主体抽象成服务于“构成价值论”的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自由意志”概念呈现抽象和空洞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发现看似自由的经济选择背后物质利益的必然要求。在马克思看来,需要不是建立在个人的意见之上,而是由生产组织决定的。生产决定需要,而不是相反,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的差异决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享受的不同程度的自由。

为说明经济范畴的进化动力,蒲鲁东进一步假设上帝的存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看似通过假设上帝存在解决了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宗教根本问题的

实证性回答,实现对传统宗教神学的反叛,解放和发展了理性的力量,但这种解放依然带有神学性质。蒲鲁东取消了对圣经式的人化上帝的盲目崇拜,却在论证普遍理性的实体性中保留了属神的东西,以一种新的人类意志的客观化完成对现实历史的统治。蒲鲁东概念的抽象性体现在从形而上学的虚构中通过词句推演现实历史的发展。但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⑤。抽象空洞的经济范畴导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直观对立,但这正是蒲鲁东的理论诉求。只有彻底割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他才能借助系列辩证法论证使用价值先于交换价值存在的历史顺序,从而说明二者综合后的构成价值出场的合理性。

(二)对劳动价值论的曲解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在劳动价值论上玩弄词句的企图。蒲鲁东认为劳动的价值在本质上是服务于理论建构的虚构,就像李嘉图讨论地租时假设资本的生产性一样。蒲鲁东认为,“我们说劳动具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商品,而是因为我们假定它隐含着价值。劳动价值是一种循果溯因的类比说法”^⑥。“劳动价值”一词在蒲鲁东看来是一种语言学上的简便,是对“劳动从事生产,资本获得价值”的互文式简略。在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蒲鲁东提出了劳动构成论。“价值就是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方式自然地形成的社会里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产品价值就是“以货币符号来表示这种产品在总财富中所占比例的公式”^⑦。蒲鲁东承认财富以劳动为尺度,但认为政治经济学首要解决的是价值的构成规律,这是区别于价值的衡量单位的价值的比较点。他举例说明价值构成理论讨论的是几何学上的长度作为比较点的科学性,而政治经济学则在争论到底是以圆周还是人掌长度作为度量单位。前者是价值理论的主要问题,后者则处于次要地位。

其次,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劳动平均化公式的谬

误。蒲鲁东在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向构成价值转换的过程中,给出构成价值交换的平等公式,即“劳动是价值比例的原则”^⑧。但是蒲鲁东理解的劳动是一种对现实具体劳动进行思维加工后的抽象化劳动,这种劳动在社会平等规则的驱动下会上升为“完成了的社会化劳动”,他解决劳动不平等问题的方法需要借助这种价值经过综合确定的劳动。在蒲鲁东看来,经过综合后的等量劳动日和劳动量可以换取同量的劳动日和劳动量。由于所有的劳动都完成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改造,最后的社会化劳动是达到综合的、在质的规定性上达成一致的平均化的劳动。此时,人们以劳动量为尺度进行的交换,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公平交换。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将这种经过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平均化劳动直接定义为社会化劳动,并以此作为永恒公平的公式。

最后,马克思通过说明机器劳动中劳动的现实的平均化指出蒲鲁东在抽象公式上完成的平均化不仅是一种空洞的虚无,而且是一种已经被现实实现过的平均。机器工业时代,劳动的平均化非但没有带来人的平等,反而进一步加深人对机器的依赖,占有机器的企业家和使用机器的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被进一步拉大,由此说明了蒲鲁东以劳动平均化实现社会平等的前提公式是无效的。

(三)对社会历史真实经济结构的遮蔽

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批判蒲鲁东在忽视社会历史的真实结构的基础上歪曲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叙述的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⑨。蒲鲁东试图从意识出发构造抽象概念反对现实的矛盾,想象历史的主体并在意识中推演其发展。最终成果是运用系列辩证法和二律背反矛盾的解决说明构成价值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但是构成价值理论叙述的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是在以逻辑剪裁历史基础上关于空洞的抽象叙述的观念的历史。^⑩因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将概念抽象化的目的在于为其天才般设想的构成价值和

经济进化系列服务。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借以编排次序的思想材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个人不是以现实的方式组织生产的普通个体,而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蒲鲁东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公式实现的抽象范畴,通达的不是具体的经济事实,而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粹理性的语言”^⑪。相比于逻辑学,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更多的是语言学上的具体化。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蒲鲁东的抽象中最后只剩下纯粹的量的逻辑范畴。

首先,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在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时,主观裁剪了供需关系,仅从供给方面论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反比关系,却没有看到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带来的奢侈品定价高、日用品定价低的问题上,蒲鲁东割裂了生产和需要的关系,仅从交换环节批判,没有看到价格受供求双方关系的影响。蒲鲁东试图用二律背反解释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等现实经济生活的具体运动,却仅从简单的知性思维形式出发将经济范畴内部的矛盾抽象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绝对对立,否认了矛盾双方之间的联结,所以经济范畴的进化体系更多只是僵死的运动。

其次,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蒲鲁东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却通过对李嘉图和蒲鲁东的比较,说明蒲鲁东构成价值论形成的历史叙述方法的空洞、虚幻。蒲鲁东从结果开始建构,撇开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运动,把构成价值作为起点,发明新的综合公式。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将现实经济关系的运动以理论的形式表述为经济发展的公式;蒲鲁东则从公式出发,尝试组织现实的经济生活,即“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⑫。蒲鲁东看不到真实的经济联系,所以只能通过逻辑重新组织孤立的经济事实,运用粗陋的形而上学知识加以歪曲和捏造,说明构成价值的合理性。

最后,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谬误产生的根源在于把“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看做结果”^⑬,将平等分配看

作交换产生之前人们普遍承认的抽象社会规则,颠倒了交换和分配的发展历史。在说明比例关系与供求关系的联系时,蒲鲁东颠倒了现实中的供求对比例关系的决定作用,从供求平衡后的比例关系中抽象出实现供求平衡的公式,从而在思维中通过事先确定比例关系而达到供求平衡,保证供需双方的公平交换。此外,马克思还批判蒲鲁东将金银的货币属性看作君主确认的结果。蒲鲁东在叙述金银作为交换等价物合理性的过程中,将君主作为确认金银是价值构成的第一种商品的“普遍理性”的化身。因此,在构成价值的运用上,蒲鲁东没有说明社会总财富的计算公式,仅提出了比例,相当于在数学上给出了公式,却不代入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数值。在这个过程中,他把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虚无化了,蒲鲁东的“点金术”终究只是一种观念中自我满足式的空想。

二、对蒲鲁东“历史叙述方法”的方法论批判

蒲鲁东对抽象的错误理解,用他自己的话加以概括,“信徒们愈是想把自己所崇拜的偶像理性化,就愈是抽掉了一切能够使它成为现实的属性”^⑤。马克思批判他的历史叙述方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考察形式,试图以公式的运动代替现实的运动。具体而言,马克思将蒲鲁东运用系列辩证法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细化为三个阶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历史叙述方法展开了全过程批判,以真实的历史反对神圣的历史,以历史的辩证法否定系列的辩证法。

(一)以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编排经济范畴的历史顺序

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范畴历时性的前后更替展开批判,认为经济范畴是作为共时性的存在彼此联系。这些经济范畴并不是机械的、线性的更替,而是根据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蒲鲁东对普遍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说明中处处体现了叙述方法上的自相矛盾。他以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编排经济范畴的历史顺序,在说明交换起源的过程中假设了具有自由

意志的买卖双方。但是蒲鲁东的普遍理性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自由意志也是抽象的自由与蒲鲁东个人主观的意志的结合。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抽象发展到最后,“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⑥,不再考虑经济范畴的现实内涵。这样的历史顺序是非历史的、非现实的、非社会的。蒲鲁东以“社会天才”的身份自诩,认为自己搭建的行动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充分运用上帝赋予的能力的结果。其真实的目的在于以普遍理性的权威性为自己站不住脚的、空乏的经济矛盾体系提供合理性论证。他将社会历史划分为十个阶段,但是这样的划分标准不存在统一性,也是超历史的、毫无合理性的。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在对范畴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一切现实的范畴都是蒲鲁东建构经济体系的工具,矛盾都是相对的存在,构成与和谐才是绝对的。

其次,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对经济观念的历史溯源是通过假定的方式展开的。蒲鲁东以普遍理性的展开说明经济范畴的产生,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假定。这种假定在思维的真空中抽象地演绎经济范畴的具体产生。这样的运动是思维中的抽象运动,具体化的过程只是抽象思维逻辑演绎的具体,根本达不到现实的具体的丰富程度。蒲鲁东认为价值的可变性不是商品本身的属性,而是“人们的观念”强加于商品之上的。所以,商品内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解决在蒲鲁东看来就是一个运用逻辑综合人们观念中二律背反的过程。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与李嘉图的学说做对比,目的在于说明蒲鲁东的体系远低于他批判对象的水平。“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解释误当做一种新科学的基础”^⑦。

最后,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历史叙述方法的最终结果是把“历史学变成心理学”,不再考虑现实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历史的作用,仅从社会天才的角度分析经济范畴在观念上的进化顺序。这种抽象的思

维方式,割裂了经济范畴和现实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只有在现实生产关系存在的前提下经济范畴的内涵才具有真实性。因此,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叙述方法,即“不死的死”无法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更无法说明生产关系变化带来的经济范畴的进化,看不到经济范畴的暂时性和历史性。经济范畴连同普遍理性都在蒲鲁东历史叙述的真空中漂浮不定,失去现实基础,仅作为抽象的存在游离在现实的经济发展的之外。

(二)以永恒经济范畴把握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将抽象的经济范畴等同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以经济范畴在思维中的综合解决经济发展各阶段的矛盾。“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⑩。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历史叙述方法与其说是哲学、逻辑学的方法,不如说是修辞学的应用。因为蒲鲁东在叙述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⑪。因此,他在思维层面对经济范畴发展的演绎仅仅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术语溯源史,在他关于具体历史进程的叙述中现实在他的理论之外。所以才犯了把稀少当作交换价值、众多当作使用价值的语言学上的逻辑错误。构成价值论消解了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积极性,认为只需要通过重新恒定价值的比例关系、恢复平等的价值公式,即可解放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平等公式是撇开生产关系的空洞抽象,无法调和直接劳动者和积累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平等的现实经济矛盾,其寻求解放的、自以为是的、幻想的价值构成公式实质上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事实相抵触的”^⑫,这种囿于循环论证的方法的错误根源在于用尚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蒲鲁东用劳动量确定交换价值

量和使用价值量,从而说明二者在价值比例关系的综合下形成的构成价值量。但蒲鲁东对劳动量的衡量是通过价值比例关系确定的,具体的比例关系公式在他看来是先验性的存在,是由社会天才决定的。因此,无论是作为中介的比例关系,还是作为公式两端的劳动量和价值量,都是无法以具体数值确定的,整个公式就是建立在社会天才想象中的抽象的公式。蒲鲁东对其具体化的过程就是掩盖社会天才的空想性,在现实经济运动和抽象公式平衡中循环论证,实现的是一种绕圈子的具体化叙述,看似进行了系统论述,其实只是从起点出发,回到起点的思维纯粹运动。马克思总结道,在蒲鲁东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他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⑬。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以形而上学割裂了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使得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分解为数量相等的单个社会阶段,在叙述对象、叙述过程和叙述结果中都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蒲鲁东尽力阐明作为叙述对象的各个社会阶段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服务于自己构建经济进化体系的目的;而不是调整自己的目的以适应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叙述对象的进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是观念中的历史与资本主义现实中贫困的历史的对立,现实的历史只有根据观念的历史重组才能消除贫困问题。在叙述的过程中,由于社会阶段之间彼此联系,导致对单个社会阶段的叙述必须依靠其他社会阶段的补充才能揭示其运动的规律。但在蒲鲁东的进化体系中,单个社会阶段的出场顺序都受到普遍理性的严格规定,后者无法说明前者的合理性与消极性;后者也只能从前者获得积极性的论证,前后两个阶段的现实性都只能被片面呈现,无法把握各个经济阶段的全貌。这导致蒲鲁东的历史叙述是一种忽视客观经济事实的主观上的随意。在叙述的结果上,马克思指出,依靠“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无法说明社会关系之间彼此联结又共同存在的

社会有机体的丰富内涵。因此,蒲鲁东通过永恒化的经济范畴搭建的只能是机械联系和线性的历史,历史的辩证性和丰富性在蒲鲁东的抽象真空中窒息,仅留下了机械的具体和僵死的运动。

(三)以天命目的论阐明社会历史进程

马克思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描述为一本充满神秘、启示、神等概念的“圣经”,批判他将确定价值的比例关系看作是“命定的过程”,绝对平等被当作先验性的社会价值目标,即“天命的目的”。蒲鲁东以“命定”的方式赋予价值比例关系以先验的、因而是无须也无法证明的最高目的,以神圣的目的反对政治经济学世俗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诉求,从而达到“一切矛盾的普遍的平衡”。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创造价值出发,去说明劳动时间决定了生产商品的先后顺序,从而决定了供需关系,这是以“立法者”的身份为其构成价值理论辩护。一方面,在蒲鲁东看来,劳动也是普罗米修斯在“神秘本能命令”下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活动,从而将人主观需要的物质基础神秘化,将主观的自由意志神圣化。因此,蒲鲁东无力把握历史的发展,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则“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③。进一步地,蒲鲁东从价值的比例关系中得出了“任何劳动必有剩余”是普遍和绝对的真理的结论,这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政治经济学无法证明这个观点是因为在所有制的惯例下劳动的剩余被神圣化的宪法权利盗窃了。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基于范畴的进化演绎社会历史发展。蒲鲁东认为“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④。因此他认为商品的生产不是同时进行的,复杂一级的商品是在简单商品生产完全满足需要后才在新的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需要决定了生产的发展,这与范畴的进化顺序相一致,更高级的概念是在低级概念成熟

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对此展开批判,认为主观安排商品的生产顺序,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⑤的天真行为。

在本质上,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命定论的根源在于蒲鲁东将矛盾理解为“一种谬误”“虚无的同义词”。作为二律背反中的反论,在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中,矛盾是必须被彻底消灭的坏的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对抗内容,是从外部寻求综合因素以进行协调与达成和谐的最后一步。因此,蒲鲁东虽然承认矛盾的必然性,但是却指出解决矛盾的办法不存在于矛盾双方内部,而总是在矛盾双方的上空生成一个新的概念以协调二者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看似以“消毒剂”的形式发挥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作用,保留了各经济阶段好的方面、消除了坏的方面,在下一个经济阶段实现了综合。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阶段内部的矛盾是蒲鲁东抽象地建构起来的。因此,蒲鲁东的和平药方最终将他导向了虚无的历史。“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个方法就像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新陈代谢的实际规律’而想按照‘亲和力’的规律来改造新陈代谢一样地荒谬绝伦”^⑥。

三、对蒲鲁东“历史叙述方法”的理论实质的批判

马克思不仅对蒲鲁东历史叙述方法的具体内容展开批判,而且深入探讨了其历史叙述方法走向唯心主义的根源。蒲鲁东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叙述过程并不是理论上升的过程,而只是循环的机械运动。他虽然标榜自己的“系列”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但他“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⑦,在历史叙述上导向了粗糙的历史唯心主义方法论。在对范畴的概念界定上,他的历史叙述方法仅仅是对德国观念论的简单模仿;在对范畴的运动规律的把握上,他的历史叙述方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借助辩证法的手脚架搭建出的经济进化体系“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⑧。他叙述的历史既不是黑格尔式的观念的历史,也不是现实经济发展的真实历

史,仅仅是纯粹观念的叠加,不具有任何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德国观念论的粗略模仿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观念无限地超越了现实经验,和资产阶级殊途同归,“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②。蒲鲁东的历史叙述方法倾向于从经济学家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经济范畴出发,完全漠视实际存在的关系。通过形而上学的推理重新编排经济范畴的历史,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些抽象的范畴具体化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蒲鲁东并不认为自己的概念是空洞的,反而认为通过形而上学重组的经济范畴在消除前一阶段矛盾的过程中获得了实在的内容和历史的形式,从而具有实存性。这种推理性的知识结构作为思想的产物,更关注的是概念范畴的演绎逻辑,而非建立在经验现实的基础上。蒲鲁东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推理方法遵循观念支配历史的原则,始于一个笼统的抽象命题,最后推导出一个具体的结论或命题。所以,他的叙述方法的发展轨迹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主观想象,观念本身就是空洞的、虚伪的、荒谬的、无根的,“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无法增加概念范畴的任何实质内容,只是“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③他对经济范畴的排序推动的只是概念的影子之间的斗争,对概念的理解是一种缺乏本质探索的、直观的抽象,甚至没有达到黑格尔的辩证程度。

蒲鲁东的概念生长于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但是由于自身哲学知识的匮乏,导致在富饶土壤上开出先天具有缺陷的系列辩证法。蒲鲁东理论的主观主义在于想通过个人意志把矛盾的经济范畴重新用观念结合起来,并坚持形而上学是政治经济学完成调节的场域。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解决二律背反的途径是在人类知性的彼岸中进行,是“他自己的知性所

不清楚的事情”^④,“甚至最无聊的空话对他们来说也比用来论证经济学说的最简单的事实更有意义”^⑤。所以,在本质上,这种企图以形而上学调和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只能是一种虚构。蒲鲁东不仅没有克服抽象概念的天真,反而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天才的天真。

(二)“冒牌”的黑格尔辩证法

相比于黑格尔具有历史感的辩证法,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更多是“‘科学’的令人十分厌恶的胡扯和以‘科学’自诩的虚伪言词”^⑥。狡猾的蒲鲁东选择辩证法的原因在于试图用黑格尔的“矛盾”代替康德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从而为历史叙述提供科学的手段。蒲鲁东“用抽象和矛盾的概念”替代现实的、丰富的经济事实,提出符合普遍理性发展要求的综合的公式,用抽象概念的二重性推演通达新的抽象概念的具体,这是“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⑦。这种“相似的辩证法”以主观唯心主义矮化客观唯心主义,使辩证法的革命作用束缚在二律背反的脚手架中。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把辩证法矮化为变戏法的把戏与其说是狡猾,不如说是出于无知的幼稚。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具体意义上把握真理的革命方法,作为其合理内核的矛盾是充满活力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于同一个共同体中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都不把对方排斥于矛盾关系之外。黑格尔在致杜博的信中提到,“理念就是前进,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因为一切事物在开始时总是抽象的。这种前进被表明为自身从自身的前进和发展。总而言之,理念在自身本质上是具体的,是有差别的统一,而最高的统一是概念和对象的统一”^⑧。此外,黑格尔认为,辩证法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⑨。绝对精神兼具“实体”和“主体”,超越了有限的人的自我意识而成为绝对自我意识,它作为理性化的上帝,担当着消除分裂和异化的重

任。但在蒲鲁东那里,绝对精神仅发挥着消除经济范畴内部矛盾的中介作用,真正作为宇宙万物本质和基础的“实体”是社会天才的观念。这不仅矮化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本质,而且弱化了客观精神的实在性,宣扬了主观精神的永恒实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被设定为蒲鲁东辩证的逻辑主体,经济范畴则被当作中介,现实的生产关系却成了“象征”和“宾语”。在蒲鲁东的逻辑具体化的过程中,矛盾的革命作用被消解,综合也始终是绝对主义一元论的面具,消除坏的方面的矛盾解决方法切断了辩证的运动过程,辩证法的活力溶解于个人意志的消毒剂。

此外,在辩证法的具体环节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把肯定环节与否定环节混为一谈,使有机联系的辩证法简单化。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最后达到的合题是“通过对两项绝对对立的观念不断地肯定或不断地否定(因为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而得出来的”^⑤。在蒲鲁东看来,肯定和否定是一回事,都只是“概念之间断层的板块式的叠加”,其目的都是为最后的“合题”服务。合题实现的程序就是两个绝对对立概念的“彼此捕捉,互相吸收”,最后形成一个“具备两者原有的一切积极特性,清除了它们各自的消极特性”^⑥的高一级混合体。新范畴代替旧范畴的根本原因在于新范畴具有充当旧范畴消毒剂的工具性作用,可以通过消除旧范畴的“不好的方面”综合形成作为下一阶段的新范畴。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辩证法的内容就是“随手拈来一个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⑦。在这个过程中,肯定环节和否定环节变成了工具性的存在,各自都不具有区别于他者的特殊规定性,二者的区别是次要的,二者的同一才是蒲鲁东肯定二者存在意义的原因。因此,肯定环节和否定环节在蒲鲁东的辩证法中只是一种过程性、阶段性的存在,最终只能以被主观裁剪过的片面形式存在于合题中。

最后,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在寻求综合的过程中

忽视“合题”产生的条件性。蒲鲁东“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⑧,所追求的构成价值、综合、和谐、平衡等就是系列辩证法中的合题,即“两种相反的概念结合为高一级的第三种概念”,其作用在于“提供确实而完整的观念”^⑨。但蒲鲁东消解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辩证运动过程中的条件性,视其为一种无条件的、必然的、自发的运动。

综上所述,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作为匮乏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试图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却对科学辩证法的灵魂一无所知,“蒲鲁东的哲学观点是法学唯心主义和被歪曲了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混合物”^⑩。因此,尽管“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⑪。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的保守性源自他以“普遍理性”取消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回避现实的矛盾,仅在对黑格尔精神绝对化的粗糙模仿中解决思维中的矛盾。系列辩证法只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漫画式的模仿,用“普遍理性”替换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是在概念术语上的变戏法,不仅称不上高明,而且还是一种机械式的矮化。

(三)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在对蒲鲁东历史叙述方法的前提、形式和具体内容展开批判后,马克思意识到蒲鲁东唯心主义的系列辩证法产生的根源在于其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导致的必然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以构成价值论为中心建构的社会经济学把经济社会理解为“以工资形式领得自己的产品的直接劳动者”^⑫组成的社会,这完全是充满行会习气的“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⑬,直接表明了蒲鲁东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以劳动平均化实现社会公平的观点,在本质上混淆了衡量劳动价值的两种不同方法,其结果是将生产费用和工资、工资和产品价格混为一谈。这实质上加深了李嘉图揭露的亚当·斯密的错误,是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理解上

的谬误。而“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现的宗派创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④。蒲鲁东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私有制的崇拜被包裹在绝对平等的糖衣之中,这样的暧昧做法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危害性更强。

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使蒲鲁东无法从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角度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可调和,只能把经济合乎逻辑地发展规律看作是“命定的过程”,认为它具有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绝对性,而这种绝对性实际上就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蒲鲁东看到了资本主义所有权的矛盾,但是他对矛盾的理解更多是小生产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蒲鲁东对社会主义的彻底批判使得其在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的同时,也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蒲鲁东对共产主义的批判源自共产主义要求推翻包括个人所有制在内的所有权体系。因为在蒲鲁东看来,个人所有制是政治经济学的根基,是一切经济矛盾产生和解决的根源,因此否定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连提出自己进化过程的第一项也办不到,更不用说建立自己存在所必需的系列了”^⑤。蒲鲁东通过对经济发展历史的辩证运动的认识,最终得出的错误结论是实现社会平等必须依靠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至此,蒲鲁东彻底跌落小市民的幻想中,他自以为所完成的批判,不过是和现实妥协,为自己所不理解的社会辩护。所以,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⑥。恩格斯犀利地指出了蒲鲁东的社会经济学不过是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的批判,蒲鲁东“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⑦。

因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是“好心肠的资产者和仁慈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只是一种“天真的愿望”。蒲鲁东自诩为社会天才的代表和发言人,所希

望实现的是小资产者和大资本家的和谐相处。他以劳动平均化消除的贫困仅仅是有产者的贫困,他的构成价值理论混淆了工资和生产费用,始终从小资产者的社会关系出发建构社会经济学,因此他的理论和历史叙述方法具有矛盾的、双重的性质,是“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⑧,并最终倒向为所有制辩护的庸俗道路。

与之相反,马克思的历史叙述方法是通过唯物辩证法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叙述,以再现经济发展历史的方法;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从现实出发,以科学的辩证法把握历史的发展,开辟了超越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粗糙的经验主义”的科学的历史叙述方法。他真正完成了对黑格尔颠倒了辩证法的二次颠倒,并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革命性地实现了在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基础之上,通达现实具体的历史叙述。马克思在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产生、发展和最终宿命,最终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辩护。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④[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

⑥[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9页。

⑦[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0页。

⑧[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

印书馆,2010年,第12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3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页。

⑭[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3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8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㉒[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7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㉔《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95页。

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09页。

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页。

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27页。

㉝[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6页。

㉞[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页。

㉟[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3页。

㊱[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3页。

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6页。

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7页。

㊴[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3页。

㊵孙伯鍈:《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7页。

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9页。

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页。

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21页。

㊺[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88页。

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页。

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页。

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页。